

一
十
里
铺
大
捷木
二
冬

吕梁市兴县二十里铺村至明通沟村约3.5平方公里的一片区域,是著名的二十里铺战斗遗址。1940年7月4日,八路军120师在贺龙、关向应的指挥下在此设伏,歼灭日伪军700余人,创造了一个远距离运动打击的战例。

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之门户,也是华北、华东敌后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交通枢纽。1940年初,日军在晋西北周围常驻三四个旅团,又从太原和晋南抽调约两个旅团,纠集兵力2万余人,企图分割八路军抗日根据地。

6月中旬,日军在米峪镇惨败后,集中兵力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疯狂报复,先后占领方山、临县、岚县、岢岚等县城,并进至黄河沿岸的碛口、黑峪口地区,炮击陕甘宁边区河防阵地。6月28日开始,敌人从窑头、岚县、保德、岢岚等地纠集了3500余人,分四路向兴县大举进攻,妄图袭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党、政、军指挥机关。进占兴县之敌第9混成旅团,企图与我军决一死战,在兴县城内大肆烧杀抢掠。贺龙决定集中独1旅、358旅和第3、5支队等共六七个团的兵力,在二十里铺以东伏击敌一部或大部。

7月4日17时,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进至二十里铺至石槽沟一线山梁,此地是一个深山峡谷,两面是悬崖峭壁。我军在此埋伏,战斗打响后,从山头向日寇射击,从两面悬崖上扔下来的手榴弹把在谷中行进的日军打得狼狈不堪。黄昏时分,715团也参与了战斗,同心协力狠狠打击了敌人,日军不得不撤回阳会崖,明通沟组织防御。

此时,我军士气正盛,根本不给日军缓冲之机,各部队除留一部兵力守备阵地外,主力于20时隐蔽下沟,冒雨向敌进攻。全体参战勇士甘冒枪林弹雨,以低劣装备、用生命之躯打击敌人。由于天下大雨,边区产的手榴弹受潮炸不响,战士们端着刺刀,挥舞着大刀与敌人进行肉博战。

7月5日拂晓,我军经长途行军,日夜作战,弹药不足,难以坚持较长时间作战。据此,贺龙当机立断,命令我军以少数兵力在原地监视,牵制敌人,主力撤出战斗。

天刚亮,兴县之敌1200余人进至二十里铺与奥家湾之间,与716团2营遭遇,2营随即进行阻击,敌即集中火力掩护部队向东突围。我军1营、3营立即对敌进行包围打击。9时许,3架敌机支援敌步兵向我715团阵地进攻,我军以4团一个营占领洞沟附近之大山阻击敌人,掩护独1旅后撤,715团以交替掩护的办法,于12时全部撤出战斗。下午,由兴县向东突围之敌向白家沟、吕李沟东进,与界河口、恶虎滩之敌汇集。7月6日,日寇经大蛇头退回岚县,沿途遭我军第3、5支队袭击,我军主力部队也向西南转移,战斗结束。

二十里铺战斗进行了三天两夜,共歼敌700余人,给日军以沉重打击,从而胜利结束了整个晋西北1940年夏季的反“扫荡”战役,进一步巩固了晋西北根据地。

红色记忆

外交家常惠

陈静强 杨苇

西汉大臣常惠,太原人,是活跃在汉武帝、汉昭帝、汉宣帝三朝的外交活动家,功绩卓著。

“常惠,太原人也。少时家贫,自奋应募,随移中监苏武使匈奴,并见拘留十余年,昭帝时乃还。汉帝嘉其勤劳,拜为光禄大夫。”(《汉书·卷七十》)

汉武帝天汉元年(前100),常惠奉武帝之命以副使身份随苏武出使匈奴。缺乏和盟诚意的匈奴单于扣留了他们,拘禁苏武于北海(今贝加尔湖一带)牧羊,囚禁常惠于官府牢狱。常惠恪守民族气节和信念,坚持19年而不屈。

汉昭帝即位后,匈奴与汉和亲。汉廷寻求苏武等人,匈奴谎称苏武已死。后来常惠偷偷向汉使详细陈述了他们在匈奴的情况,并教汉使对单于说:“汉家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,射得一只大雁,脚上系着帛书,上面说苏武等人在北海。”汉使按照常惠所教的话去责问单于。单于十分惊讶,以为是天意,遂向汉使说:“苏武等人的的确还活着。”就这样,苏武、常惠等九人顺利回到汉朝。

这便是“鸿雁传书”的历史掌故。在这次汉使归国的斗争中,常惠显示出高明的外交才能。

常惠还是一位颇谙兵法的军事将领。西汉本始二年(前72),匈奴发兵车师,同车师军合击乌孙,宣帝“以惠为校尉,持节护乌孙兵”,共同抗御匈奴。

常惠同乌孙将领,率五万余骑,“从西方入至右谷蠡庭,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、名王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人,得马牛驴骡骆驼五万余匹,羊六十余万头”。常惠圆满完成使命,不仅维护了乌孙的安宁,且保证了汉朝与西域通道的畅通,因功被封为长罗侯。

接着,汉帝“复遣惠持金币还赐乌孙贵人有功者”。先,龟兹国曾杀汉校尉赖丹,凶手未伏诛,常惠奏请顺道击龟兹,宣帝不许,大将军霍光令其“以便宜从事”。常惠从乌孙回国途中,发西国兵二万人,龟兹东国兵二万人,乌孙兵七千人,欲三面夹击龟兹。龟兹国王见状,只好将凶手姑翼交出,处斩。

因常惠“明习外国事,勤劳数有功”,代苏武为典属国;而又因其功卓著,接替谢世的赵充国为右将军。

晋人物

图片来源:百度

大盂为县八百年

王新德 王俞钧

在今太原市阳曲县大盂镇一带,曾在周代春秋时期设立过县,是阳曲境内设立最早的县治。

早在上古时代,阳曲县大盂镇一带均为大泽所淹,水海一片,方圆百里,深不见底,曾有鱼类、犀牛等动物生存,亦有少量新石器时代和“仰韶文化”同期遗址。传说大禹治水时,带领船队在大盂东山(今系舟山)系缆绳于岸边大石上,后来才“打开龙门汇,空出大盂川”。大盂者,因四周有系舟山、峰坡山、石岭关、东西阎王台、马鞍桥等山峦环绕,中间低凹,恰似一个硕大的盂,故名大盂。于是大盂先民始在大盂川这片肥沃土地上耕作生活,并逐渐形成村落乃至村落,随着人口增加,成为一处集镇,为大盂城雏形。

大盂川一带在殷商属冀州的方国燕京戎辖地,后属唐国;西周时属北唐属地;周幽王十一年(前771),犬戎攻破镐京,周平王东迁洛邑,开启春秋纷争,此时大盂川一带属晋国,初为晋太子邑。晋献侯四世孙奚为晋大夫(前556)时,食采于祁(今祁县东南),遂以祁为氏,名为祁奚。至祁奚之孙祁盈时,大盂川一带为祁盈之田。为管理生活方便,祁氏在此设邑建城,亦称孟邑、大孟城。《后魏书·道武本纪》谓之“大祁城”,可能是因之原为祁氏之田,故而名之。

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八年(前514)“夏六月,晋杀祁盈及杨食我。食我,祁盈之党也,而助乱,故杀之。遂灭祁氏、羊舌氏。”“秋,晋韩宣子卒,魏献子为政。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,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。司马弥牟为邬(今介休东北)大夫,贾辛为祁(今祁县)大夫,司马乌为平陵(今交城西南)大夫,魏戌为梗阳(今清源)大夫,知徐吾为涂水(今榆次西南)大夫,韩固为马首(今新绛西北)大夫,孟丙为孟邑(今阳曲大盂一带)大夫,乐霄为铜鞮(今沁县西南)大夫,赵朝为平阳(今临汾县南)大夫,僚安为杨氏(今洪洞南)大夫。”

上段《左传》文字,是目前见诸史籍中,最早提出“孟丙为孟邑大夫”,且“孟邑”为“县”的史料。文中之“邑”,是指采邑、封地或民众聚居的地方,古亦称县;“孟邑”则指大

孟这个采邑、聚居地;“县”则是一级行政区。在春秋各国的争霸分合中,周代中央集权下的行政区划逐渐形成,当时的“县”,多为兼并他国所得,或同于鄙、野,或同于封邑。至春秋晚期,“县”作为成熟的行政区已登上了历史舞台。周振鹤在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》中认为,“县”要满足国君直属其地、中央任命长官、人为划定幅员、统辖乡里基层四个条件。历史上第一批符合这些条件的县,正是晋顷公十二年(前514)所置的“祁氏七县”与“羊舌氏三县”。至此,孟邑提升为孟县,这是今阳曲这块土地上最早建县的地方,至今已有2536年了。

这个孟县位于什么位置呢?唐李吉甫撰《元和郡县图志》(卷第十三河东道二)载:“故孟城,汉孟县也,本春秋时晋大夫祁邑,在县东北八十里。”宋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、明《永乐大典太原府志》、清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、清《道光阳曲县志》等志书亦有与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相同的记载。从唐代至清代,虽然阳曲县治所有更迁,但“故孟城”及“汉孟县”均记在“阳曲县”条目下之“县东北八十里”,即今阳曲县大盂镇一带。

北魏郦道元撰《水经注》曰:“汾水又南出山,东南流,洛阴水(今杨兴河)注之。洛阴水出新兴郡,西流经洛阴城北(今阳曲东黄水镇洛阴村北),又西经孟县故城(今阳曲县大盂镇南)。”《春秋左传》昭公二十八年,分祁氏七县为大夫之邑,以孟丙为孟大夫。”清顾祖禹撰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四十:“大孟城,府东北八十里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八年,晋分祁氏之邑为七,孟县一也。胡氏曰:汉置孟县,盖本治此。后魏时谓之大祁城。”现代研究《左传》集大成者杨伯峻所著《春秋左传注》第1493页,注明“孟丙为孟邑大夫”的“孟”,即今太原阳曲县大盂镇。据谭其骧主编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(1996版)及《山西文华·山西历史地图集》所示,春秋、战国、东汉、西汉、魏、西晋历史地图的“孟县”均标注在今阳曲大盂镇名上。

依上可知,孟县从晋顷公十二年(前514)立县,经春秋时期(属晋国)历时38年、战国时期(属赵国)历时254年、秦代(属太原郡)历时14年、汉代(属太原郡)历时405年、三国魏(属太原郡)历时46年、西晋(属太原国)历时51年,至东晋318年废孟县,在今阳曲大盂镇一带连续建县达800多年。

孟县被废270多年后,隋开皇十六年(596)又分置孟县。隋大业二年(606),在阳曲县东邻的原仇县重建孟县(今阳泉市盂县)至今。

从以上资料还可看出,孟县于公元前514年建县,比晋阳城(公元前497年出现,兴于赵国赵鞅,曾为赵国都城,秦太原郡治)设立早了17年。

现在,东晋废孟县已过去了1700多年。到阳曲县大盂镇一带寻访古迹,但见石岭关城墙倾圮,系舟山绿树掩映,大盂村里留下些传说故事。大盂村往北10余里,有三和店、三畛等古村落,城垣犹存,古庙依稀,亦为明代旧物。另有一村,离大盂村15里,名曰古城,村内老街、老庙、老院历历可见,有一耄耋长者曰:少时尝见一碑,仅记碑文首句有“古城者,汉之初阳曲古城也”之句。古城村,莫不是昔时的“大祁城”?

清道光《阳曲县志》“历代阳曲古城附”下,对“大孟城”有记:“一统志,在县东北八十里。《左传》:晋分祁氏田为七县,孟丙为孟大夫是也。汉置孟县,后魏曰大祁城。《方舆纪要》:其城左右狭涧幽深,南面大壑,隋开皇亦置孟县,即今大盂镇。镇西南六里高村之东,犹传西教场、顺城街之名。每值春夏之交,天方明,烟雾中隐隐有城一座,垣堞门楼皆备,人或有心穿入则不见,日出烟消始失。”以上记载,可以说就是“海市蜃楼”的典型体现,这也是大盂镇一带地气湿润,周高中低,容易形成此状的道理。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,大盂古城已不是“海市蜃楼”,必将成为太原北部的一座新型现代化城市。

位于运城市新绛县的绛守居园池,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隋代府园林,由县令梁轨修渠引水开创建设,体现了古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。

隋开皇十六年(596),绛守居园池民众饱受干旱之苦,尽管有汾河流经,但解决不了九原一代高坡地的灌溉问题。为解决困扰百姓的难题,县令梁轨实地考察,征询民意,在绛州城外的九原山鼓堆泉发现大小泉眼29个。于是,他做出一个润泽千秋的大胆决定:引此泉水,灌溉周边良田,以解民忧。

当时,北方没有引水浇灌良田的先例,且生产工具落后,此工程需开山凿洞、逢沟建桥,十分困难。梁轨与民众一起筑土架桥,凿石钻孔,经过多个春秋的奋斗,终于引来清泉30里,凿出12条水渠,其中一条经过绛州县城,其余经冯古庄、三泉、水西、南王马、北王马等村庄,最后流入汾河。每到夏、秋,渠水蜿蜒而下,沿途浇灌百顷良田。苇稻藕田,分布两岸,一派江南景色。鼓堆泉开发之早,与晋祠齐名,而灌溉效益及面积亦在省内名列前茅。

民众感其功德,自发修建、扩充园池。园内营建莲花池、子午梁、洞庭亭、虎豹门、香轩、望月亭、苍塘、白滨等建筑与景观。唐长庆三年(823),绛州刺史樊宗师写下《绛守居园池记》称:“台亭沼池之增,袭以奇意相胜”“锦绣交果,枝香靓丽”。

宋、元时期,建祠立庙,加强管理,弘扬这一水利工程。到了明代,知州张宏宇、白璧倡导团结用水,传为美谈。此外,唐宋文人岑参、欧阳修、梅尧臣、范仲淹等都游园感赋咏叹,历代传扬。在这些诗词中,以范仲淹的《绛州园池》为最。

绛守居园池纵20丈,横48丈,合20余亩。其中水面5亩,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/4,大部分水在途中作田园灌溉及居民饮水之用,其余自园西北入口导入西部水池,再由水池导入园东的“苍塘”中。这样通过“苍塘”既增加了水面,又解决了退水处,这种经济合理的用水方法,使蓄水与灌溉、功能与审美有机结合。绛守居园池以自然山水为主体,以园林建筑小品作为水景的点缀。井阵形的轩舍是典型的隋唐建筑,形制简明,小巧玲珑,与周围景致共同营造出古朴幽雅的雅致。

上世纪70年代,人们发现绛县席村一块出土的石碑上赫然写着“永护泉源碑记”。石碑是由鼓堆泉浇灌沿线“泉东八村和泉西七村”15个村庄的村民于清乾隆二十五年(1760)所立。据专家考证,此为关于保护水资源环境的乡规民约,从生态保护、赏罚和资源权属等方面,给后人留下启示。千余字的碑文痛陈凿石毁坏泉源和水利设施之过,对一桩雍正年间破坏泉源的案件作了记载,又将乾隆二十一年(1756)江汝林、程世通等27人“不畏法仍蹈前辙,在‘东八西七’村沿溪一线私采乱建”之事及相关人名刊列石碑上,如同现今的“黑名单”。对违法村民的惩罚也别具一格,碑文记载将一部分罚款用于护泉,另一部分罚款用作鼓堆娘娘庙的油灯之费。碑文最后提出的“官山不应私卖”,更是给后人以深刻的警醒。

纵观《永护泉源碑记》,不难看出古人之生态理念及自发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实践。



羊头山游伏

侯文宜



每到暑伏时,晋城市高平周边有“游伏”的习俗,亦称“伏游”或“游福”。旧时伏天,附近府官县令常到高平北边的羊头山避暑,颐享炎帝所开辟之山水圣境。渐渐地,暑伏头一天,高平、长治、长子一带的人们遂习惯于游羊头山,到山南麓的神农庙九华池龙嘴上接几瓶圣水,或自饮,或带给家人,以享羊头山野趣和始祖灵佑。

除羊头山“游伏”习俗外,山西北部忻州市五寨、宁武、岢岚三县也有“游伏”习俗。这些“游伏”习俗基本都是以避暑为主,伴有游玩观景的内容,在时间上也都与特定节令密切关联,于是形成确定的、同时性的群体行为,即在每年初伏的第一天,家家户户都相携走出家门,到青山绿水间游览、避暑、拜佛、祈福,故又取“游伏”谐音称为“游福”,这是几地游伏习俗的共同之处。然而,羊头山“游伏”习俗与五寨、宁武、岢岚三县的“游伏”相比,有不同的内涵寓意。

其一,地点选择不同。山西北部的游伏,没有核心地点,五寨大多数的人家考虑路途远近,多是选择南峰水库和清漪河两岸,在山水间享受大自然;宁武当地居民往往上管涔山、登芦芽山;岢岚人多年来游伏的地方大体是仙人洞一带。总之,这些山水地似无特定信仰内涵。羊头山“游伏”则不然,高平周边可游的名胜或山水风景也不少,如发鸠山、七佛山、大娘山、佛教名寺定林寺等,为什么民间选择去羊头山“游伏”呢?这与炎帝历史文化和五寨、宁武、岢岚三县也有“游伏”习俗。这些“游伏”习俗基本都是以避暑为主,伴有游玩观景的内容,在时间上也都与特定节令密切关联,于是形成确定的、同时性的群体行为,即在每年初伏的第一天,家家户户都相携走出家门,到青山绿水间游览、避暑、拜佛、祈福,故又取“游伏”谐音称为“游福”,这是几地游伏习俗的共同之处。然而,羊头山“游伏”习俗与五寨、宁武、岢岚三县的“游伏”相比,有不同的内涵寓意。

其二,情感信仰不同。民俗一般都寄托着某种信仰和美好心愿,例如山西北部的“游伏”,民间说法是在这一天出游,能游掉疾病、避免苦难、换来祥和。高平羊头山“游伏”亦有免除疾病之义,但所蕴含的意义更多。当地把羊头山上的炎帝庙称作“大庙”,即本地最高等级和庇荫后代的大庙。因此,羊头山“游伏”的核心是瞻仰炎帝神灵,这与当地民众的共同信仰有关。羊头山古碑中有“神农圣灵所托”之语,当地自古将神农炎帝看作是羊头山神。在后世炎帝的尊神化过程中,羊头山作为一方神灵圣地的神秘色彩更是在民间广泛流传,故人们认为到此地会获得神灵的保佑。于是“游伏”便逐渐演变成了“游福”的含义,然游伏登羊头山,主要信仰在炎帝五谷神老爷。

其三,行为内容不同。暑伏头一天是燥热,一半是繁盛,山川河流显露蓬勃生机,柳荫深处花香鸟语,寻找夏日中的清凉和美景是游伏的基本内容。山西北部三县的“游伏”似未见到有祭祀性质的记述,尽管五寨有拔野艾和龙须草拿回家晒干用于熏蚊、扎笤帚的习惯,但只是一般游玩顺便形成的习惯。而羊头山“游伏”的重要内容就是烧香祈福。虽然也有在佛龛前烧香的,但更多的是在神农庙或神农庙的龙嘴泉前烧香祈福。人们对炎帝的崇拜甚为流行,故“游伏”之际祈拜炎帝是必不可少的。

笔者曾在高平民间调研,就此民俗进行探访。住在羊头山脚下西沙院村的李俊英老人对“游伏”记忆深刻,不仅入伏头一天去羊头山,二伏、三伏每一伏的头一天都要去羊头山“游伏”。游到半山上的平缓地,千佛碑巨石下面有个台阶,过去人们就在台阶那里烧香。当问到给谁烧香时,他说:“当然是给羊头山老爷烧香。”所谓“羊头山老爷”,指羊头山神农炎帝,在当地有三个俗称皆指神农炎帝,即“羊头山老爷”“炎帝老爷”“五谷老爷”。据说,现在一般是在羊头山的神农庙里烧香,其时也有卖杂货、卖食物的,所以人们又称之为“伏会”。说明游伏传统习俗和民间文化得到了延续和传承。

晋民俗

长子猪头肉